



「近代中國婦女、國家與社會 (一六〇〇~一九五〇)」國際會議 的召開及其意義

A Review for the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Women, Nation and Society in Modern China (1600-1950)”

張 斐 怡 (Fei-yi Chang)

國立清華大學歷史研究所

Postgraduate, Department of History, National Tsing-Hua University

壹 ● 會議緣起

這一年，關於中國性別史的研究特別地活躍。2月，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召開“New Directions in Chinese Women's History”國際會議；6月，中國近代史學會主辦「橫看成嶺側成峰：婦女史與性別研究」研討會，以及8月，漢學研究中心主辦的「欲掩彌張：中國歷史文化中的『私』與『情』」等三場會議，就已經足夠讓相關領域的研究者，有相互討論及觀摩的機會。最後登場的是8月23日至25日由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主辦的國際會議——「近代中國的婦女、國家與社會（1600-1950）」，展示了主辦單位十年來對「近代中國婦女史」研究推廣不遺餘力的成果，它的討論豐富而精彩，為學界掀起一陣不小的波瀾。會議中集結了臺灣、大陸、香港三地，及美、英、日、澳等各地優秀學者的出席，顯示十年來累積及培養了厚實的人脈及成員，可說是近代婦女史學界一次空前的集合。討論的主題囊括目前熱門

及新興研究角度，包含國家、性命、法律、社會、美感、教育、文藝、家庭、戰爭及跨文化中的婦女等十個主題，企圖以寬闊且多元的角度，為近代婦女的多種風情及面貌進行解讀及深入的研究。

本文以介紹會議的內容為主，在結論中企圖透過對會議內容的了解，對這次會議的召開在婦女史學界及研究發展中的意義，作一番討論及深層的思考。

貳 ● 會議內容

會議從葉文心的專題演講：「歷史圈套與文化困境——談『中國婦女』」正式展開。此演講對二十幾年以來以「中國婦女」為主題發展的各項研究，從學術或文化史的角度來觀察，提出若干值得反思與細究的問題。她認為相關的討論，應從革命及殖民話語的邏輯中解放出來，並且避免成為歷史邏輯下的圈套，及語言運作中的盲點。以下筆者即循著會議進行的主題，做一簡單的記錄。



歷史上的婦女除了那些曾「破壞」政權運作的宮廷女子外，總是被排除在談論關於「國家」的主題時被忽略。但以下三篇文章，卻要改變我們以往的想法。Susan Mann “Womenly Sentiment and Politics Crises: Chang Ch'ieh's Poetic Views of the Mid-Nineteenth Century”，以十九世紀清代一位女性作家的出生背景，及由她創作的一首以關懷國家命運詩，說明女性透過與男、女性詩友的交流，並融合女性的個人情懷，藉詩抒發個人情感及對國家命運的關注。但這樣的關懷還是在私人的情感之中，至於婦女實際擁有參政權，則是民國建立以後的事。張玉法：〈二十世紀前半期中國婦女參政權的演變〉，以二十世紀前半期西方傳入婦女參政的思想，及中國內部幾場革命運動的推波助瀾，說明女性參與政治運作的權利被告知後，經過極力爭取，取得了與男子相同的選舉權，以及十分之一保障名額的被選舉權的過程。而國家的動盪不安，又為兩性關係帶來何種的影響？呂芳上：〈革命與戀愛：一九二〇年代中國知識分子的情愛難局〉，認為近代中國變動政治、社會中，個人的婚姻、感情也隨之改變。在二〇年代，雖然「自由戀愛」已成為知識分子的共識，然在「革命」風潮下，情愛中的個人主義無法施展，私情必須在集體的革命情感中，才有發展的空間。

在中國傳統社會中，對男命與女命意義的認定，有極大的差別，男命才是一個主體，女命僅是男命的附屬。因此，梁其姿提醒我們女命在中國歷史上，存在著無法解脫的「困境」。重男輕女的觀念，不僅在傳統中國，並延續至現代。著力於明史研究的林麗月：〈風俗與罪愆：明代的溺女記敘及其文化意涵〉，認為明代溺女現象產生的原因，在於當時對嫁妝習俗的奢侈。而從當時勸戒溺女的濃厚倫理色彩文字中，反映了明代菁英秩多的情結，但沒有關於性別的論述。呂妙芬：〈婦女與明代理學的性命追求〉，從明代理學對女性道德理想規範的看法，發現理學並沒有提供一條女性修身養性的途徑。在理學中，女性被要求的仍只是「聖母賢母」的傳統形象，對女德、婦學的極為重視，理學終究不是女性可涉足的領域。張哲嘉：〈明清星命書中的女命〉，自星命學的角度，探索明清時期女命的論述中的性別意涵。他認為傳統的命書中將男命及女命分開，女命的變化雖多，但仍不違「夫為妻綱」的倫常。因此，「女命」概念不僅合乎傳統中國宇宙觀中的陰陽思想，並與性別

關係結合，與中國兩性關係史的發展密切相關。

由於法制史的發展，透過法律史料來解釋社會現象的討論不斷出籠。因此關於婦女問題的研究，也開始應用法律方面的資料。定宜莊：〈從婚書契約看清代的婦女再嫁問題〉，由婚書契約看清代寡婦的再嫁問題，不但說明婚書已成為男女婚姻成立的法律憑證，也從再嫁問題的處理中，更貼近地得知婦女受男權社會支配、社會地位低下的事實。因夫妻失和進入法律程序的討論，則有劉錚雲：〈從夫妻失和看清代婚姻關係中的兩性認知——以史語所藏內閣大庫檔案乾隆朝案件為例〉，透過乾隆朝的內閣大庫檔案整理，得知部分的夫妻關係合乎傳統「男尊女卑」的禮教規範，也提出丈夫以經濟因素而受妻子嘲諷，與傳統禮教的要求大不相同的事實。賴惠敏：〈清旗人的家庭糾紛（1644-1770）〉，也以清代案件形式的史料，觀察旗人婦女的生活，說明旗人婦女入漢地生活後，受儒家傳統觀念的影響，在家庭制度上採大家庭制，女子的貞節觀念也已漸次傳開。民國建立後，女性終於有能力干涉法律條文的更動。梁惠錦：〈婦女與婚姻自由權（1920-1930）〉，從法律條文的轉變著墨，說明民國初年的婦女受西方個人主義及自由戀愛、結婚等風潮的影響，繼而爭取到婚姻自由權的過程，並且進一步地說明當時的許多相關的法律仍不能配合，婦女的婚姻自由仍不是全面的現象。從這些法制史料看來，可以檢討的是清代至民初社會中，透過法律所得知的下層婦女的社會地位，及部分執法人員的男女觀念，可補充現有研究對於下層社會婦女的不足之處。

婦女如何突破「私」領域，進入「公」領域的議題，從第二波婦女運動以來，就持續地討論著，歷史學者也未在這場熱潮中缺席，尤其應用在與社會互動關係的議題上。就英治時期的香港而言，葉漢明：“Chinese Society, Colonial State: The Protection of Women in Early Colonial Hong Kong”，以「妹子」在被留存的現象出發，說明這是一個受殖民母國及被殖民地的男權社會間，透過對東西文化差異及各自的合理性的原則協調後的結果，而被犧牲的即是這些貧苦出身的「妹子」。Gail Hershtatter：“Making the Visible Invisible: The Fate of ‘The Private’ in Revolution China”，從陝中及陝南地區的婦女勞動，說明「家庭」的概念，如何由晚清「非私人」的意象，受到五四時期強烈地批判，在1949年後變成一個人類活動中殘餘被動領域的「私人」意象。王政：



〈社會性別與 50 年代上海城市社會的重新組織——居民委員會的故事〉，則是以五〇年代調動婦女做為基層社會管理者的上海居民委員會，說明這個組織的二面性：一方面使得女性在公領域中得獨立的身分；但同時又是國家利用的角色，呈現女性從「私」領域出走，進一步地與「公」領域間互動產生的多元性。關於「公」與「私」的問題，已經累積不少的研究。然而，縱使傳統中國的「內、外」已經固定，作者們的探討，顯示在各種時空中仍會有不同的呈現。

婦女與美感的主題，因應了當代社會對於時尚及美的要求而產生，也反映學者從當代需求來對傳統中國進行了解。認識近代時尚的發展，可從當時傳播媒體的記載觀察，羅蘇文：〈清末上海都市女裝的演變（1880-1910）——以《點心齋畫報》、《圖畫日報》為例〉，從《點心齋畫報》、《圖書日報》中顯示的上海地區女裝的時尚，不但說明女裝代表性別標識及身分標識的改變，也呈現女裝表現女體曲線、個性特點發展，走向中西文化的融合。又有 Antonia Finnane（安東籬）：〈The Art of Fashion in 1950s China: Aesthetics, Politics, and Self in the Work of Yu Feng〉，以一位女性的服裝設計師為例，說明女性在統治者標榜「艱苦樸素」的風氣之下，以女性對時代、自然的感念而設計的服飾風格。以女體為主的討論，則有游鑑明：〈美人變種？近代中國有關女子健美的言論（1920-1940 年代）〉，從 1920 至 1940 年代的報刊資料中，說明除了「保國強種」的國族論述，及兩性權力分配的討論之外，當時的論述論及女性地位，也強調健美對女性「個人」的影響及意義。從時裝及女體來觀察近代的女性，可說是在文字之外，婦女另一種自我表述的呈現。

教育可說是為婦女開啓閨闥的一扇窗，因此，教育的問題在婦女史的研究中，一直受到相當程度的重視。然而有些女教，仍停留在傳統的教養婦女順從之大德，藉以鞏固父系家庭的結構得以和諧綿延的型態，還必須深究。Paul Bailey：〈“Unharnessed Fillies”：Discourse on the ‘Modern’ Female Student in Early Twentieth Century China〉從清末及民初時期女學生被社會要求的形象，說明即使是受教育，女學生仍有被侷限在傳統中國女性的「合宜」舉止與角色的可能性。除了國內的教育之外，大開門戶的近代中國，女生也有步出國門、開展見聞的機會。林維紅：〈面對西方文化的中國新女性——從《曾紀澤日記》

看曾氏婦女在歐洲〉，以曾紀澤家庭中的女性為例，透過曾紀澤出使日記的關於妻女及妹妹生活記載，說明當時隨之出使的女子們對於西方文化接受的態度及程度。而 Joan Judge：〈New Lin Daiyus: Female Overseas Students in Japan in the Early 20th Century〉，則是更直接地討論女性赴日留學的情況。從民族主義、文化使命、及日本知識、職業女子的形象為主題，說明這些女性的留學生活、社群活動等層面的現象。

婦女的文藝創作，是研究者長期以來珍視的史料，因為創作不但顯示婦女拓展了生活空間，也具備聽到「女性自己的聲音」的重要性。這發聲的機會，卻從孫康宜自以下學者的研究中，找到不同形式的「焦慮」。蔡瑜：〈晚明女性詩評與傳統詩學的對話關係——以《名媛詩歸》為例的探討〉，以晚明時期《名媛詩歸》一書，探求男性詩評家標揚女性詩作的動機，並且提出女性作品中「清」的特色，說明女性詩評在明末詩壇的作用，呈現的是男性讀者的焦慮。在戲曲方面，華瑋：〈無聲之聲：論明清婦女戲曲中之情、欲書寫〉，以「情、欲書寫」的角度，探索明清婦女藉著戲曲的創作，抒發現實社會中無法滿足的各種情感欲望，並展現其與男性作品不同的「揚情輕欲」特質，呈現的是公與私之間的焦慮。Ellen Widmer：〈Honglou meng ying and Three Novels by Women of the Late Qing〉，比較標示及未標示作者為女性的女性創作的二種形式，說明 19 世紀中葉至 20 世紀初的五十年間，女性創作者從限制走向公開的心態轉變，呈現的是作者的焦慮。胡曉真：〈閨情、革命與市場：由民初彈詞小說家姜映清談起〉，則是透過對清末民初彈詞作家姜映清的生活、創作的了解，重塑民初女性創作通俗小說的環境及心態，及其在傳統與創新間的矛盾情緒，並歸結到民初上海文學市場中，女性作家的角色及位置，呈現的是市場的焦慮。

傳統的婦女以家庭為生活的重心，為主要的生活場域，是故婦女與家庭的關係，也是婦女史研究的主題。在大家庭中的角色與地位，有陳慈玉：〈婚姻與家庭勢力：日治時期基隆顏家的婚姻圈〉，以日治時期基隆顏家的婚姻圈為例，說明當時縱橫工商界，且有文士之名的顏家，不但堅持傳統中「傳子不傳女」的理念，即使有高學歷的女子，也多在家中相夫教子，特別的是，某些媳婦因本家背景的關係，卻可過著家庭與工作兼顧的生活。日本學者前山加奈子：〈近現代中における母性



主義（試論）——「私」から「公」へ〉，觀察中國近代「母性」形象轉化的問題。他認為母性的形象，被從傳統的「家」移到具有生、養及教育「新民族、國民」的特性，吊詭的是，這轉變與女性解放雖是同時發生，但母性主義與女性解放的道路依然是十分不同，母性主義被要求的是扮演多重的角色。至於殖民時期下階層婦女的家庭生活，Paul Katz：「Social Struture and Marriage Patterns in East Haven Private: A Preliminary Analysis」，透過臺灣東港地區的研究，了解到由於當地男性必須出海捕漁，迫使女性工作，於是當地女子有晚婚的現象。說明了社會結構及經濟環境對女子結婚年齡及婚姻型態的影響。

在歷代的大、小民變及國際性戰爭中，除了縱橫戰場的「英雄式」男性之外，女性總是被忽略。然而即使女性不是挑起戰事的主角，戰爭仍對女性的生活也造成相當的影響。巫仁恕：〈「妖婦」乎？「女仙」乎？——論明代山東唐賽兒的形象轉變〉，以明永樂年間的唐賽兒為例，說明明代以降對於這段民變的記載，以性別及階層文化的角度說明士大夫與對民變婦女態度及看法的轉變，是在正、負面的形象間擺蕩，完全是男性面臨外在環境變化下的產物。沈潔：〈偽滿統治時期婦女參與社會活動的背景以及特徵〉，說明偽滿統治下的婦女所面對的複雜現象，他們既要面對一個男權宰制的社會，還要面對一個殖民社會，迫使中下層婦女參與社會勞動呈現一個複雜的構圖，加深了婦女社會的徘徊和迷茫。羅久蓉：〈戰爭與婦女：從戰後漢奸審判看兩性關係〉，從法律及社會兩個角度，來看戰爭時期婦女所面對的雙面角色，透過女畫家李青萍的審判案例，說明婦女一方面得以具備更多的主動性及積極性，但又無法超越大環境的束縛。很明顯地，我們看到的是女性在戰爭中所面對的兩難，既被要求成為戰時的英雄，又要與男人一般為戰爭付出，但仍逃不過傳統的評價框架。

二十世紀經過二次的戰爭，美國逐漸成為今日所見之世界強權，而中國婦女如何受這強權的影響，如何面對強權的入侵，如何與美國文化互動，都是得討論的問題。在清末的中國境內，中國婦女與美國文化接觸的管道，最多的即是教會文化的推廣。林美玫：〈美國聖公會女傳教士在華活動：以上海聖瑪利亞女學（1881-1907）的發展為例〉，以上海聖瑪利亞女學為例，說明美國世紀之交時女權運動的發展，透過教育體制中的女教士，

帶給中國婦女兩性平權及經營生計的概念。鮑家麟：「The Chinese American Matriarchs in the Southwest」，則是關於移民美國後的中國婦女生活史的討論。透過四位活躍於二十世紀美國西南部的中國女性生活的研究，呈現中國婦女移民之後，一方面培養並伸展自己與家庭之外社會溝通的能力，謀求自我實現，另一方面則仍保有中國傳統婦德的現象。周慧玲：〈投射好萊塢、想像熱女郎：1930年代好萊塢電影與中國電影中「女明星論述」的跨文化交涉〉，以三〇年代中國的電影界挪用好萊塢的女明星行銷包裝策略，與中國女明星的表演方式比較。說明女明星如何以女性的意識型態，參與建構文化的集體意識。這移植的結果，一面與傳統語言結合，一面成為現代性想像的投射，並從而擴散為文學、美學、表演學等其他領域的文化交涉。

綜合討論中，帶領討論的五位學者從三天會議以來的觀察，提出許多深刻的見解及省思。高彥頤將婦女史研究的發展分為三階段：第一階段，五四時期的婦女史觀，為依附男性的歷史。第二階段，婦女史的定位在婦史解放史。第三階段，婦女史成為文化史的一部分，即是放在社會性別史範疇中。因此她強調歷史絕非一成不變，最終的目標是要不斷地顛覆、超越自我。林維紅則以其在臺灣大學開設婦女學程的經驗，強調跨學科的交流與對話，對於婦女史研究的啟發及延展性，不但可提供歷史研究者新的分析範疇及豐富的辭彙，亦助於歷史學與理論的有效結合。她進一步地說明，婦女史的研究不是僅在解讀史料，而是更能提出許多發人深省的解釋及分析。Susan Mann 指出她認為中國傳統即有「內、外」、「男、女」、「陰、陽」等性別次序觀念長存於中國，非自外國進口。如何揚棄西方及以西方文化為基礎的理論來研究中國婦女史，使中國婦女史由西方回到東方的中國，是日後研究必須努力的目標。Gail Hershatter 提出的感想有三：

- 一、放棄進步即走向更好未來的推論模式。她建議不要再以悲劇性的議題或無出路模式，來解釋二十世紀的中國性別史。
- 二、超越現有的中心的研究，較邊緣的主題、區域及時間應漸次受到注意，從邊緣的研究更能釐清何謂中心。國族論述也須被延伸而納入日常生活，並配合生活的例行公事，才能有其力量及效能。
- 三、帝國晚期及二十世紀研究的主題可以相互發明及進



行對比，更清楚何謂傳統，何謂現代。並應用新的研究方法、資料的應用，如口述歷史、法律檔案等等。熊秉真則綜合了五位學者的意見，思考未來進一步推展的問題。一方面促進明清及現代研究的整合，不再各說各話。另外，一方面轉變以往為求完整的「補遺式」的論述，期望新的研究能夠經歷多重學科的挑戰、砥礪之後而有新的呈現，並永遠要有反省，永遠要有不足，才能有更大的進步。

參 ● 討論與結語

8月23日至25日，筆者參與了會議全程的進行，會議間發表者的丰采固然吸引注目，評論及自由發言的討論，也讓人獲益匪淺。會議結束之後，當筆者試著要去了解這場會議召開的意義時，不禁想起十年前召開後引發不少省思，由1992哈佛大學舉辦的一場會議（以下簡稱哈佛會議）：“Engendering China: Women, Culture, and the State”（用性別觀念分析中國：婦女、文化與國家）。當時主辦者強調，這是一場以性別角度的新觀點來研究中國的會議，希望看到與以往不同面貌的中國。¹而這個領域開創以後的今年，近史所召開的此次會議，代表了十年來中外學者以性別角度研究中國歷史的部分成果。以下筆者即以二次會議若干可比較之處，對於此次會議召開的會議，粗淺地對提出本次會議召開意義的想法。

開啓以性別的角度研究中國史，無疑的是以西方學者為始。在十年前的哈佛會議結束後，中國與西方研究者研究方法的差異，就成為討論的焦點。羅久蓉認為中、西在性別的研究中，在基本上雖可相通，然而由於文化、歷史、政治發展的差異，意見仍有分歧。西方學者應在理論與史實之間尋找平衡點，中國學者則應跳出

複雜的現實束縛，擴大視野。²大陸學者李小江也認為中西學者頗有差異。西方學者以「女性」的立場，側重分析，論述多為婦女與國家利益間的「衝突與對抗」，中國學者側重描述性的解說，論述多為婦女與國家的兼容與互促。³筆者從此次會議觀察，發現上述的現象，已有些許的改變。西方學者受理論擺布的狀況已有減弱；大陸的學者在中國大環境改革開放的帶動之下，也有逐漸擺脫現實包袱，接受並了解理論應用研究方法的趨勢；而以臺灣的學者較能結合史料與理論，做出平實的推論，這都顯示三方在調和研究方法截長補短上的努力。西方漢學界以西方式的理論來研究中國文化受到爭議，是長久以來的問題。這個問題首先是由 Paul Cohen 在八〇年代發難，指出研究中國近代史，應從中國的歷史經驗來研究中國，而非利用西方的歷史經驗。⁴然而92年，哈佛會議中強調用「性別」來研究中國的問題，可說仍是以西方的意識型態來研究中國。在性別意義由西方傳入中國的今天，從哈佛會議到此次的會議中，我們發現縱使是華人社會出身的學者，也或多或少受西式性別意識的影響。然而令人興奮的是，此次會議的綜合討論中，Susan Mann 做為一個西方中國婦女史學界的重量級學者，提醒大家以中國傳統的性別觀念為角度進行研究，不僅饒富意義且極為發人深省。

雖然以西式的性別意識來研究中國婦女史，會造成結論中的些許偏差，一直是研究者的問題之一，相關的爭議及討論也時有所聞。⁵筆者個人認為，採用西方的各式理論研究中國婦女史，非但不能說是阻礙女性或性別史研究的發展，反而說明婦女史的研究與當代社會互動的成果，並且使得研究能更多層次地與歷史上的各個層面相結合，而不是研究婦女史即只論及「婦女」的歷史。從「Women's History」到「Gender's History」的發展，便是受理論影響而使研究有所擴展的最佳例證，哈佛會議亦是這項轉變的成果之一。⁶此次會議在這層意

1 Christina K. Gilmartin, Gail Hershatter, Lisa Rofal, Tyene White, eds., *Engendering China: Women, Culture, and the State*,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4. pp1-2.

2 參見羅久蓉，〈書評：Engendering China: Women, Culture, and the State〉，《近代中國婦女史研究》3（1995年8月），頁263-275。

3 李小江，〈序言〉，《性別與中國》（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4），頁7。

4 李榮泰等譯，《美國中國近代史研究》（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91）。

5 參見許慧琦，〈近代中國婦女史研究與方法的討論〉，「橫看成嶺側成峰：婦女史與性別研究」學術座談會論文。

6 羅久蓉，前揭文。



義上的轉變，筆者所期待的是將理論與史料中呈現的歷史情境相配合。以女性主義為例，它對婦女史研究的影響的發展，自不在話下。會議中學者一再提及的「公」領域與「私」領域的論述，即是其中的廣泛為學者應用的理論之一。與會學者羅蘇文認為「公、私」領域的（即內、外）定義模糊，又在各種不同的時段與朝代有不同的呈現，要完全定義婦女的「公、私」領域，是十分危險的行為。因此，筆者以為對傳統中國女性而言，「公」領域到底如何定義，「私」領域又應如何定義？誠然是個複雜的問題。然而可確定的是，昔日從事研究時的以西方、現代性形式的主觀認定，必然有缺失，應力求從史料的爬梳，回歸中國的歷史情境，再去辨別「公」領域與「私」領域的分野，或許才能更貼近歷史的真相。

事實上，無論是中、西方各門各派的理論應用在歷史研究，都是一種跨學科間對話的成果。⁷ 婦女史在跨學科對話上的成就甚有成果，成為歷史研究中不斷與其他學科融合的代表，也是婦女史研究者深感自豪之處。哈佛會議舉辦時，即是結合歷史學與文學、人類學等不同學科的研究成果。此次會議跨學科的成效是更進一步的，從會議對於與會學者及擔任評論者的安排，可見主辦者的用心。例如文學方面的研究，此次會議中「婦女與文藝」的主題，邀請了四位以研究女性文學的學者發表專論。而「跨文化的婦女」的場次中，則邀請研究電影傳播文化的周慧玲擔任講者，並由專長美國文化研究的趙綺娜為評論者。在「性別與法律」的場次，三篇歷

史學者的作品，則邀請了政大法律系的教授陳惠馨做為評論者。他的評論透過法學的角度，補充了歷史學者對於法學名詞認識的不足，及對名詞定義的缺乏，並從法律社會學的觀點，提供更多觀察案件史料以解釋社會現象的角度。這些來自不同研究領域的學者，不但讓此次會議的精彩之處增添幾分，更是讓研究歷史的象牙塔向外延伸。就如羅久蓉所言，婦女史的研究可接納不同的聲音、關懷、切入點，從比較異同，從而對婦女史研究領域有較為全面的把握，並對自身的立場做一番省思。⁸

從 1992 年的會議到 2001 年的會議的比較，我們可以發現其中有著「變」與「不變」的二個面向。中、西方婦女史研究者的研究方法，是「變」的一面，雙方不斷在調合及互相學習中努力，並在這個過程中出現了創新；而「不變」的是跨學科整合的現象，不斷地持續進行，並有擴大的趨勢。歷史雖強調「變」，並一直在尋找變化的原因，但歷史更是多元的，「變」與「不變」都應是歷史研究所重視及企圖解釋的。因此，無論是「變」與「不變」，都是研究者所欣喜樂見的成果。

十年前，哈佛會議是費正清研究中心第一次以「婦女」為主題而召開的國際會議，此次會議則是臺灣地區近史所的第一次，兩會議的召開堪稱具有婦女研究史上的特殊意義。若說婦女史研究的興榮，也是超越父系家族藩籬目標的指標之一，⁹ 那麼今年的會議，可說是帶進了一個新的起步。而由會議論文集結成的論文集，正在編纂者的積極編纂中，必然又是一本內容充實的書即將出版，值得我們期待。

漢學研究通訊第二十卷第三期（總79期）發行份數

	臺灣地區	其他地區	合計
個別學人	816	528	1,344
機構學校	260	495	755
	1,076	1,023	2,099

7 關於跨學科應用的方式，可參見《近代中國婦女史研究》3（1995.8），其中三篇文章各探討地理學、社會學、人類學、醫療社會學對婦女研究的影響。

8 羅久蓉，前揭文，頁 264。

9 李貞德，〈超越父系家族的藩籬——臺灣地區「中國婦女史研究」（1945-1995）〉，《新史學》7：2（1996.6），頁 156-157。